

前见：从历史走向生命深处

——基于对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分析

韩苏桐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常州 213159)

摘要：在西方诠释学史上，前见曾是理解者获得文本原意的阻碍，是理性发展道路上的批判对象。而前见合法性的恢复则取消了前见与理解、理性的绝对对立，前见作为传统与人的生活相融合的产物，既具有它自身的历史性，又是理性得以发展的基础。前见合法性的恢复也促成了理解从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变：理解者的处境映照其生命现状，它促使理解者通过前见向历史寻求经验智慧，以解决其生存发展问题，理解者也沿着前见走在自我生命的实践道路上。

关键词：伽达默尔；诠释学；诠释学循环；生命关联；视域融合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 (2022) 04-0088-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2.04.013

Prejudice: From History to the Depths of Lif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adamer's Hermeneutics

HAN Sutong

(The Marxism College, Changzhou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China 213159)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hermeneutics, prejudice was an obstacle for the readers to obtai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an object of criticism on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reason. However, the restoration of prejudice legitimacy eliminates the absolute opposition between prejudice and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 As a produ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human life, prejudice not only has its own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is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ason. The restoration of prejudice legitimacy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a shift in understanding from epistemology to survival theor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readers reflects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 life, and it motivates readers to seek experience and wisdom in history through prejudice to solve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then, readers also follow the prejudice to walk on the practical road of their self-lives.

Key words: Gadamer; hermeneutics; the cycle of hermeneutics; the relevance of life; fusion of horizons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前见有其特殊的作用和地位。从定义上讲，前见是指理解者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所形成的关于被理解对象的先入之见。从作用上讲，前见与理解形成的新的诠释学循环，打破了施莱尔马赫提出的由文本整体到部分的诠释学循环模式，使历史与现在在交流中形成了生命关联。从地位上讲，前见合法性的恢复，奠定了理解的生存论基础，理解也由此完成了从认识论到

生存论的转变。可以说，前见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闪耀着生存论的智慧与光芒，显现了历史和传统对个人生命走向的巨大影响。

一、前见作为理解的对立面

纵观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前见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其合法性，而是首先在认识论的基础上作为理解的对立面而存在：圣经诠释学和浪漫主义诠释学为

收稿日期：2021-11-26

作者简介：韩苏桐（1995—），男，江苏淮安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诠释学研究。

追寻文本原意，要求理解者克服自身前见；启蒙运动为高扬人的理性，要求非难前见，批判权威和传统。

从圣经诠释学方面讲，《圣经》拥有其自身的特质，它是神借人类语言而说的话。为了了解神所传达的信息，圣经诠释者首先要理解《圣经》作者所说的话，也就是诠释经文原意。在长期诠释《圣经》经文原意的过程中，圣经诠释者们逐渐形成了一套解经规则：第一，由于《圣经》是天主借人类语言而说的话，所以，圣经诠释者在诠释经文时，他们必须要十分了解乃至遵循教会的生活传统；^{[1]29}第二，由于经文是一个整体，“在这前提下，他们排除了对《圣经》的任何可能正当的个别解释”^{[1]31}，圣经诠释者对个别经文的诠释必须在《圣经》经文的整体中进行；第三，为了避免在理解神的信息时断章取义、褻渎经文，圣经诠释者还要与神沟通，但是，与神沟通的圣职权柄属于教会，因而圣经诠释者解读经文时要在教会提供的启示下进行。^[2]这三个规则无疑透露出一个倾向：为了获取经文原意、了解神所传递的信息，圣经诠释者的个人见解必须加以限制。换言之，在圣经诠释学这里，它已经有意限制或摒除理解者的前见。

如果说教会是凭借其权威和传统而限制个人前见，那么启蒙运动则是通过批判前见而达到高扬理性、抨击权威和传统的目的。在启蒙运动那里，前见的德文（Vorurteil）表达了“没有根据的判断”这一意思。^{[3]350}对于高扬理性的启蒙运动来说，判断应当有理有据，应当通过某种方法上的证明呈现出来，如果缺乏某种方法的证明，虽然不意味判断本身的不正确，但却“意味着判断在事实本身没有任何基础，即判断是‘没有根据的’”^{[3]350}。没有根据的判断，则是不确定的，是科学认识必须排除的对象。^[4]这就是说，在启蒙运动那里，前见乃是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东西，是人们正确认识对象的阻碍。

启蒙运动划分两种前见：由人的威望而来的前见和由过分轻率而来的前见。前者指他人的权威阻碍人们运用自身的理性，后者则指人们忽视自身的理性。^[5]这种划分主要是通过诠释学领域内批判《圣经》取得的。启蒙运动之前，教会对《圣经》

的诠释大多是独断的，并以其权威迫使人们相信这些独断的诠释。在启蒙思想家看来，教会权威或者他人威望对人们的强迫很容易使人们犯错，从而无法理性分辨那些独断的诠释中哪些是意见，哪些又是真理；而人们自身存在的前见，也会干扰着人们理性的发挥，盲目树立起对《圣经》或教会的崇拜。另外，《圣经》作为历史流传物，代表着传统，它自身的内容和各个时代对它的解释，不但积淀了各个时代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风物人情等，而且它们是被书写下来的东西，“被书写下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的”^{[3]352}，即传统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这样，“启蒙运动想正确地、即无成见地和合理地理解流传物”^{[3]351}成了它自身所要面对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启蒙思想家认为，应当在理性的基础上检验《圣经》的可信性，从而清除人们对《圣经》的前见。

但是，仅仅非难人们关于《圣经》的前见，并不是启蒙运动非难前见的全部内容。由于《圣经》在西方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即它是所有权威和传统的代表，所以，启蒙思想家对《圣经》的非难，只是一次先锋战斗。彻底的、完全的启蒙运动是向着一切偏见宣战^[6]，也就是非难一切前见、批判所有权威和传统。乌多·蒂茨指出：“启蒙运动不仅诋毁每一错误的权威，而且从原则上诋毁任何一切权威。”^{[7]53}不仅如此，启蒙运动还将对传统的批判由《圣经》扩大至其他历史文本^[8]，“要求用理性的尺度，批判地剔除传统的一切成见、前见。”^[9]这样，启蒙运动建立起对一切前见的非难，同时，也批判了一切权威和传统。

启蒙运动之后，浪漫主义为传统平反。浪漫主义高扬传统，认为传统被历史所给予，传统的有效性仅仅是一种制约性，并且这种制约是先天的制约，不需要任何合理根据，人的任何思考和行为的发生，必然受到传统的影响。浪漫主义的传统观似乎是对启蒙运动传统观的批判，但是，它“却仍然没有逃出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预设，即传统与理性的对立。”^[10]由于浪漫主义高扬传统，“唤起早先的岁月，在民歌中倾听民众的声音，收集童话与传说，培养古老的风俗习惯，发现作为世界观的语言，研究‘印度的宗教和智慧’——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历史研究，而这种历史研究缓慢地、一步一

步地把充满预感的重新苏醒转变为冷静枯萎的历史认识”^{[3]355}，也就是说，浪漫主义对传统的热爱不是对传统的不怀疑、不批判，而是理性看待传统的东西，并且这种“理性看待”最终转向了历史研究。例如，浪漫主义诠释学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前者认为理解者只有克服自身前见，在心理上移情作者，才能理解历史文本的原意；后者则继承和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移情说”，认为只有体验了作者的生命历程、道德情感，才能领悟文本原意。可见，浪漫主义对传统的热爱无意中又高扬了理性，并且最终又走在了克服前见、对立起传统与理性的道路上，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所有启蒙运动的批判现在通过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这个反光镜大踏步地前进了。”^{[3]354}从这个意义上讲，19世纪的历史科学应该是这样来完成启蒙运动的：“它的最后一步是把精神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是‘通过客观认识历史世界（通过现代科学，认识历史世界与认识自然处于同等的地位）的步骤’。”^{[7]48}从这一点来讲，浪漫主义的“传统观”最终又走在了启蒙运动非难前见的道路上，并对启蒙运动的“传统观”进行了历史性深化。

简而言之，不论是圣经诠释学、启蒙运动抑或之后的浪漫主义思潮，他们都是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批判、摒除前见。

二、前见合法性的恢复

面对理解层面上前见被批判、被摒除的情况，伽达默尔从两方面着手恢复前见的合法性：一是论证前见的历史性，即前见来源于传统，它是个人无法摆脱、也无法摒除的，具有不可规避性；二是以前见的不可规避性论证权威、传统和理性并非绝对对立。

首先，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总是生活在传统之中，前见是传统对理解者的教导、与理解者的融合。关于传统，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绝不是什么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end）的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3]364}在伽达默尔看来，传统并不是外在于理解者的东西，相反，理解者总是生活在传统或某种历史文化之中，

融合、吸收着传统，践行着某种历史文化。理解者对传统的吸收、融合产生了前见。从这一点出发，伽达默尔在批判启蒙运动非难前见的做法时写道：“启蒙运动的基本前见就是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3]349}启蒙运动将前见、传统置于理性的对立面，大肆批判前见、传统，高扬理性，却又无法说明自身理性的由来。这种做法恰恰是对理性和传统关系的规避，更具体地讲，“规避”表明了一种隐晦的偏见态度。洪汉鼎认为，“从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观点来看似乎是理解障碍的前见，现在成了历史实在本身和理解的条件，因此摒除前见，不管这是否成功，就是摒弃理解。”^[11]这就是说，启蒙运动非难前见、追求理性的主张中包含了启蒙运动者们对传统与理性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先在地表明了传统对启蒙运动者们的教导，表露了“主张”中的前见，因而非难前见的启蒙运动本身也存在着前见，甚至可以说，启蒙运动是为了拥护自身前见的一场运动。由此及彼，伽达默尔写道：“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3]349}前见不是理解者可以批判殆尽的东西，也不是理解者可以摆脱的东西，前见具有不可规避性。

其次，在论证了前见的不可规避性之后，伽达默尔开始以前见的不可规避性解释权威与理性并非绝对对立。与启蒙运动批判一切权威的态度相反，伽达默尔主张辩证地看待权威：理解者应当有意识地识别权威的话语。“有意识地识别”意味着权威的话语也有正确和合理的地方，它提供了一种真理的可能性。伽达默尔从权威的本质出发介绍权威，他写道：“人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承认和认可他人在判断和见解方面超出自己，因而他的判断领先，即他的判断对我们自己的判断具有优先性。”^{[3]361}在伽达默尔看来，权威是一个中性词，权威的确属于某些人，但是人的权威并不来源于他的地位或权力，而是基于赋予这种地位或权力的东西。伽达默尔将这种东西表述为“承认”和“认可”。何卫平认为，“所谓基于一种承认或认可，也就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考虑，这里已包含了某种批判的要素：任何人的存在和知识都是有限的，他人有可能比我更正确，他人有可能比我理解得更好。”^[5]乌多·蒂茨也认为，“因为我们对真理要求

或威望要求的赞成或反对，都是基于有充分理由地对阐释者所发表的针对一篇文本或语言表述的意见的赞同。”^{[7]54}可见，“承认”和“认可”意味着他人的理解和判断超越了自己，具有一种优先性，所以，权威的基础乃是别人的承认和认可。这种“承认”和“认可”是人的前见的显现，是某种见解的表达^{[7]54}，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对权威的话语做出正确或错误的判断。如此，权威与理性的绝对对立关系就可以得到调和：第一，理解者一旦承认权威，就意味着在他的前见和理性中，已经认可了自我理解的局限性；第二，理解者对自我理解局限性的认可，对权威的承认和服从，归根到底是对自身前见和理性的认可和遵从。这样，于理解者而言，权威的话语就不是随心所欲和无理性的，而是有了客观的基础：权威乃是基于众人对自身判断局限性的承认和对权威判断优先性的认可。从这一点来讲，权威与理性并不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相反，权威基于他人的前见和理性。

传统作为权威的一种形式，它与理性并不处于尖锐的矛盾中；相反，传统与理性可以相互调和。伽达默尔写道：“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3]363}在伽达默尔看来，传统总是变化的，传统的变化意味着人为的发生。对此，乌多·蒂茨写道：“由于传统不是依靠自身而存续，而是因为人们对它的吸取和更新，并且一般来说，这种吸取和更新是以选择为基础的，因此它是一种‘理性的行为’。”^{[7]54}也就是说，传统的变迁乃是人从自身理性出发对传统做出的改变。人的理性活动以及其中涉及的对传统的变革，说明了“我们不光延续了传统，而且也丰富了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创造了传统。”^[10]这种“延续”和“创造”就是对人的理性与传统关系的合理说明：人不可能脱离理性去变革、创造传统，传统的被变革、被创造恰恰验证了传统和理性的交织。从这一点来讲，传统与理性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混成的。人们对传统的批判、变革，只是在放大并践行了自身所接受的传统的教导，也就是放大、践行了自身的某种前见。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是启蒙运动对传统的批判和浪漫主义对传统的平反都落后

于它们自身历史的原因。

简而言之，伽达默尔为了恢复前见的合法性，构建了前见、传统、权威以及理性之间的新关系：前见是传统与人的生活相融的产物，具有不可规避性；理性则基于人的前见，是人对其自身某一前见的偏好；权威则基于从前见而来的理性的认可。至此，伽达默尔调和了前见、传统、权威以及理性之间的绝对对立。

三、前见开启理解：历史与当下形成生命关联

前见合法性的恢复也促成了理解从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通过诠释学循环和视域融合完成。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循环首先是前见与理解的循环，它们使历史与现在产生了交流。这种交流虽由文本引发，却根植于理解者的现实处境。处境体现了理解者的生存发展状况，反映了理解者的现实生命诉求，促使理解者以视域融合的方式汲取过去的人类生活实践经验，以解答他在当下的生存发展问题。历史与现在于此间形成了一种生命关联。

首先，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循环思想，明确诠释学循环首先是前见与理解的循环。与施莱尔马赫以“心理移情”摒除理解者的前见从而以文本的整体与部分的循环探求文本原意的做法不同，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并不能超越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历史阶段，也无法摒除自己的前见而“移情”作者。在他看来，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循环忽视了一种最基本的循环结构，即理解与它的构成条件之间的循环，也就是前见与理解的循环。伽达默尔的这一观点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继承自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循环思想。

在海德格尔那里，“一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12]178}，“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最原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12]179}。在海德格尔看来，“对本文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前理解（Vorverständnis）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3]379}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循环不仅点明了人的所有理解都是被自身的前见先行规定，还表明了诠释学循环的重点：前见与理解的循环。这种循环被伽达默尔继承并用来批判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循环。施莱尔马赫立足于认识论所创造的诠释学循环是为了获得文

本的正确原意，文本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是一个完全表达作者原意的东西，是外循环（文本与历史背景）和内循环（文本内的整体与部分）的基础。^[13]但是，在伽达默尔看来，文本并不是确定不变的，它虽然也是理解的对象，但它同时也是联系起前见与理解循环、引发理解的介质。伽达默尔写道：“理解首先意味着对某种事情的理解，其次才意味着分辨（abheben）并理解他人的见解。因此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im Zu-tun-haben mit der gleichen Sache）。”^{[3]380}伽达默尔把事情即文本^①看作理解发生的诱因和理解的对象，他明确了两点内容：第一，由于事情是纷繁复杂、变动多样的，所以事情不能为理解提供一种正确性保证，只能说事情总与理解相羁绊；第二，事情能够引发理解，表明了理解者的前见中拥有与此事情相关联的其他理解，正如“我们只能理解已经理解的东西，读出已经读出的东西”^[13]一样，这种“相关联的其他理解”产生于过去，引发彼时的理解，并随时间的逝去而纳入前见之中。当理解者理解某一事情时，与此事情相关的前见就与这一新的事情形成了联系，形成了新的理解；同样，当此次理解完成后，它就成为前见，继续与之后的事情形成联系。这样，前见与理解就形成了一种永不停歇的循环，事情即文本成了引发理解和诠释学循环的介质。前见与理解的循环，也昭示着历史与现在的循环。前见隶属于历史和传统，表现了不同历史时代中理解者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的差别；而当下理解作为当下的活动，它表现了当代的时代意识、时代思维以及理解者的个人意识。这样，前见开启理解，就是实现了历史与现在之间的交流。

其次，历史与现在的交流使得理解是生存论的，它促使理解者以理解的方式反映、解决其生存发展问题。历史与现在的交流虽立足于文本，却根植于理解者的现实处境。伽达默尔认为，“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3]390}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的人生历

程其实是由一个又一个处境组成，处境体现了理解者人生历程中不同的生存发展状况^{[14]73}，包含了理解者所遭遇的事情。当理解者理解某一事情时，理解者在当下处境中的生存发展状况就通过理解表现出来。但是，引发理解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当下处境中发生的事情，因为“事情既不属于过去又不属于现代，而是一种共同的东西”^{[15]230}。事情作为广泛意义上的文本，它同样具有流动属性：在理解者以往处境中发生的事情，它能随着时间距离的扩展而进入当下处境中。当然，这种基于时间距离和诠释学循环的“进入”并非是旧事的完全置入，它可能是书面记载、口头相传甚至只是理解者的一段印象。旧事进入当下处境虽然意味着旧事重提，但它却引发了新的理解。

事实上，不论是当下处境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旧事，关于二者的理解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事情的理解与理解者的当下处境高度关联，并且理解总是要去反映或解决理解者在当下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也就是说，理解是生存论意义上的。由于在伽达默尔那里，理解就是视域的融合^②，所以，以理解反映、解决理解者的生存发展问题，就是以视域融合反映、解决理解者的生存发展问题。当我们深入思考理解者处境的变化时可以发现，“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3]393}这就是说，当理解者的人生处境变动时，视域不仅随之变动，而且视域本身的区域范围也随理解者的生命活动而拓宽。这样，用以理解的现在视域就体现了理解者的现下处境或处境中的生存发展状况。但是，仅仅反映理解者的生存发展问题，并不是视域融合的唯一目的，视域融合还要去解决这些生存发展问题。历时性下，理解者不仅立足于当下处境，同时也有对未来的筹划，也就是说，理解者总要突破当下的生命活动而进入下一生命活动之中。这种“突破”，就是理解者的现实生命诉求，即理解者想要解决当下处境中的生存发展问题，从而迈入下一阶段的人

①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广泛意义上的文本是指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等。

②在《真理与方法》中，“视域”是可看视的区域；而“视域融合”，就是理解者与被理解对象的视域相互融合。融合后的视域超出了各自原有视域的界限和范围，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视域。

生历程。

那么，理解者是如何借助视域融合解决其生存发展问题的呢？答案是，前见将过去的人类生活实践经验应用于当下。在伽达默尔那里，视域融合是理解者的现在视域和过去视域的融合。^{[15]228}而过去视域分为两种：理解者自己的过去视域和异己的过去视域。^{[3]394}

从理解者自己的过去视域方面来看，当理解者想解决其在当下的生存发展问题时，除了向他过去的生活实践寻求帮助，别无他法，因为理解者的现在视域正是“通过与过去的对峙而得以延伸”^{[7]102}。此时，前见就带着理解者的过去视域来到了当下。由于“理解和解释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过程”^[16]，并且人的生活实践活动凝结为诠释学经验^{[17]383}，所以，理解者自己的过去视域包含着他过去的生活实践经验。前见将理解者的过去视域带到当下，就是将前见中个人在过去的生活实践经验应用于当下^[18]，这时理解获得了它的生存论基础，即前见的合法。当前见合法时，个人过去的生活实践经验不但进入当下，而且个人的过去与现在之间产生了一种生命关联。正如伽达默尔认为，视域概念属于处境概念^{[3]391}，即理解者某一刻的视域对应着他在某一刻的处境。而任何处境由于都彰显着理解者的现实生命，反映着理解者的生存发展状况。所以，前见开启理解，不单单是理解者的现在视域和他的过去视域相融合而传递了他的过去生活实践经验，它还展示了理解者的现在生命和他的过去生命之间的关联。除此之外，前见开启理解，还彰显了理解者生命道路的连续性，使得理解者的当下及未来生存发展道路沿着前见所开辟的方向前进。由诠释学循环可知，过去的生活实践经验能被前见传递至当下，这暗示了个人在当下和过去面临着相似或相同的生存发展问题。当这种经验被应用于当下处境时，理解者无疑经历了一场生命历程的循环和体验。潘德荣指出：“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不断成为更新的统一体。”^[19]可见，正是诠释学循环的作用，理解者才能吸收前见中他的过去生活实践经验，并以此经验为指导，推动其人生不断前进、不断更新。从这一

点来讲，诠释学循环或前见开启理解，彰显了解读者生命道路的连续性，使得理解者的当下及未来生存发展道路沿着前见所开辟的方向展开。当然，这是就理解者个人而言。

从异己的过去视域方面来看，异己的过去视域指历史中他人的视域。在这些视域中，其他理解者所遭遇的生存发展问题，与当下理解者所遭遇的问题是相关联的。乔治娅·沃恩克认为，由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我们带到解释过程中的问题并不只是我们预先具有的，而是指出在我们所属的历史传统中曾经发展的问题和关联。”^[20]这种关联，使得历史中的他人解决其生存发展问题的经验传递至当下，而传递的途径就是传统。何卫平指出：“任何一个生命表现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某种人类的共同性相连的。”^{[17]225}彭启福将这种“共同性”表述为人类自身的文化传统。^{[14]51}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解者在属于这个时代的同时也属于历史，理解者所有的生活实践既表现了他的整个生命，同时也凝结为传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并随传统的流变传递至当下。如同古代诗歌记录作者的生活经历、生命情感一般，当诗歌流传至当代，当代的理解者既以其为欣赏、研究对象，又在其中寻找人生的智慧。当传统传递至当代，前见就向传统汲取力量，将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应用于当下处境。这样，异己的过去视域与理解者现在视域的融合，展现了在历史中进行生活实践的他人当下理解者之间的生命关联。不仅如此，理解者的当下生命也正沿着前见，走在了历史中他人所开辟的生存发展道路上。

至此，诠释学循环和视域融合彻底完成了理解的生存论转向：理解总是囿于处境，体现理解者的生存发展状况；而前见的合法则奠定了理解的生存论基础，诠释学循环和视域融合通过前见将过去的人类生活实践经验应用于当下，从而为解决理解者的生存发展问题贡献历史智慧，历史与现在也于此间形成了生命关联。不仅如此，作为诠释学循环和视域融合的主体，当下理解者也沿着前见，走在了自我生命的实践道路上。

从圣经诠释学、浪漫主义诠释学、启蒙运动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前见经历了由被批判、被摒除到不可规避的历程；经历了从不合法到合法的

转变,最终与传统、权威和理性相互调和。前见合法性的恢复所形成的新的诠释学循环模式,成了理解的生存论基础;同时,前见也以视域融合的方式关联起历史和现在之间的生命活动,为解决当下理解者的生存发展问题贡献了历史智慧,实现了理解从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变。而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理解者也沿着前见,沿着历史和传统,实践着自我生命。

[参考文献]

- [1] 洪汉鼎. 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 [M]. 修订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2] 帕尔默. 诠释学 [M]. 潘德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2.
- [3]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4] 陈莹. 伽达默尔精神科学思想研究 [D].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5.
- [5] 何卫平. 伽达默尔与启蒙主义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1-13.
- [6] 杜特. 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 [M]. 金惠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
- [7] 蒂茨. 伽达默尔 [M]. 朱毅,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8] 约翰逊. 伽达默尔 [M]. 何卫平,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49.
- [9] 范志同. 伽达默尔对启蒙的批判和重建 [J]. 广西社会科学,2002(5):72-74.
- [10] 胡岩. 传统与理解:伽达默尔的“传统”理论 [J]. 中州大学学报,2010,27(6):45-47.
- [11] 洪汉鼎. 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14.
- [12]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王庆节,译. 修订译本. 北京:三联书店,2006.
- [13] 何卫平. 略论伽达默尔对“解释学循环”的贡献 [J]. 社会科学战线,2019(1):34-40.
- [14] 彭启福. 理解、解释与文化:诠释学方法论及其应用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5] 格朗丹. 诠释学真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概念 [M]. 洪汉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16] 张能为.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 [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5):21-28.
- [17] 何卫平. 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 [M]. 上海:三联书店,2001.
- [18] BRICE R. Prejudice, Reason and Force [J]. Philosophy, 1988, 63(244):231-253.
- [19] 潘德荣. 诠释学导论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4.
- [20] 沃恩克. 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与理性 [M]. 洪汉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6.

